

二十世纪 中国史纲

[第三卷]

金冲及 著

二十世纪 中国史纲

[第三卷]

金冲及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3卷 / 金冲及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097-1007-4

I. 二… II. 金… III. ①中国—近代史②中国—现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622 号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著 者 / 金冲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 子 信 箱 / zongbianshi@ssap.cn

项 目 负 责 人 / 宋月华

责 任 编 辑 / 徐思彦

责 任 校 对 / 宋荣欣 桂 芳 陶 璇

责 任 印 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销售热线 / (010) 62142489 62164516

排 版 / 蒋宏工作室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 700 mm × 1000mm 1/16

印 张 / 87.75

字 数 / 1136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007-4

定 价 / 128.00 元 (全四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本卷目录

第十六章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689

新中国许多事情处于草创时期，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现在回头来看，可以惊奇地发现当年作出的那些重大决策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第十七章 抗美援朝战争 719

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是在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以前，这完全是美国政府单方面干涉中国内政，抗美援朝根本不是什么“惹火烧身”，更不是因此而妨碍了解决台湾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使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中国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任人欺凌，已不再是以往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她热爱和平，但决不能容忍别人强加于自己的威胁和侵略。

第十八章 大规模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745

在抗美援朝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同时，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短短三年内，在如此紧张而头绪纷繁的环境中，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775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就是从此刻开始的。它的主体是靠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它的两翼，在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九五四年完整地确立起来。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上）…… 843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初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严重认识不足。在经济建设中，出现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必要的；但是，把一些从善意出发提出的尖锐意见，以及虽说了错话但并非出于敌意的意见，都看成敌对势力的活动，用习惯的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八大二次会议重新突出并夸大国内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就以此为起点，一步一步地形成。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下）…… 917

“大跃进”以来的巨大挫折，使领导人的头脑逐步清醒过来，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天斗地，使国民经济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在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后，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内“左”的指导思想又迅速发展起来，把学术观点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敌我界限，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空气；这种文化批判直接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后的这十年，仍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 989

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

的那样的社会。怎样才能做到这些？毛泽东决心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并且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但他对这种“黑暗面”作了极端夸大的错误估计，甚至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又采取极端错误的方法，想经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被非法隔离和批斗达三年之久，含冤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件社会影响面很广的大事：一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件是**干部下放干校劳动**。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下） 1045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使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在**十年大动乱**中，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失去保障，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社会经济屡经挫折，拉大了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极端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社会风气和人们道德水准显著下降。它所造成的恶果，影响深远。

第十六章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694
新中国的第一年	698
最初阶段外交格局的形成	715

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从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说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

这段饱含深情的话，说出了当时亿万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使许多人听到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苦难，如果不了解先人们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曾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是很难理解这种感情的。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曾经很感慨地写道：“只有历尽灾难、饱受

[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版，第259页。

[2]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

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它的前途命运，在这以前和这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划时代的变化，集中起来就是：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除了台湾和香港、澳门以外），开始为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

第一，民族的独立。

中国人等待这一天到来，已经太久太久了。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可是在近代却大大落伍了，受尽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侮辱，被看作世界上的“劣等民族”。国家已濒临灭亡的边缘。辉煌的过去同冷酷的现实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对这种屈辱生活格外觉得难堪而无法忍受。“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由孙中山先生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响亮地喊出来后，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目标。

但是，面对着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压迫，要使中华民族从这种近乎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实在太艰难了。有些没有骨气的人曾经灰心丧气，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已经不能对它再抱多大希望。但有志气的中国先进分子却从来没有灰心过。他们咬紧牙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不管前进道路遇到多少艰难和挫折，始终顽强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是中华民族足以自豪的脊梁。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取得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这是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钥匙。

中国人民正是在实际生活中一步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在成立的第二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这以前，中国人还不曾有过这样明确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夜，中国

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地方，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被迫完全撤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先后收回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兵营的地产权，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中国国门的钥匙——海关管理权完全回到中国人自己手里。中央政府发布指示，规定外轮一般不准在中国内河航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原来享有的种种特权，被一一取消。耀武扬威的洋人得以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屈辱的一页从此翻了过去。中国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人们扬眉吐气，对祖国的明天充满希望。

第二，人民的解放。

从国内社会生活来看，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遭人冷眼蔑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到新中国将要诞生的时候，随着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总崩溃，物价飞涨，百业凋敝，更陷入难以生存的地步。新中国结束了这种状况，人民当家做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共同纲领》确定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人们相互之间都称“同志”。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一边，同时紧紧团结一切愿意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的社会力量。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阶级阶层的人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民主权利，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参加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生动地描述了他那种以前没有过的强烈感受：

“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二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

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么？”^[1]

确实，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穿着“短衫”和“工装”的工人农民，现在能够同穿着“西服”和“长袍”的人坐在一起，平等地共商大事，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一个缩影。它把民主从过去少数人的权利，变成多数人能享受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费孝通教授写道，这样的经历“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反映出这场社会大变革的广度和深度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第三，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老百姓，以往常被讥笑为“一盘散沙”。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将社会各阶层人民以空前规模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级工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学联、妇联、街道居民委员会等，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形成一个巨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网络，随时可以将民众动员起来协助人民政府完成各项工作，根本改变过去那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够雷厉风行地推行到全国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万众一心地一致行动。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形成人民政府最广泛的社会支柱。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人民政府的力量源泉。没有这一条，人民共和国一起步就能冲破重重困难，顺利发展，使人耳目一新，是根本办不到的。

新中国的建立，使已解放的广大地区实现前所未有的统一。国家成为统一的整体，在全国范围内可以通盘筹划，可以一直贯彻到基层，密切协作，一致行动。这是中国人民多年来梦寐以求而没有实现过的局面。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写道：“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互相争夺，由于各个军阀、官僚集团的互相争夺，由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由于落后的封建经济而产生的四分五裂的状态。新中国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地区。国内人民间的团结、各民族间的团结日益加强。这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

[1] 《费孝通文集》第6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6—97页。

一，这种统一局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 如果国家还像过去那样四分五裂或者各行其是，而不能在统一意志下，采取步伐一致的行动，那么新中国以后那样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现代化也是难以做到的。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都是新中国的主人。中国的民族关系有着自己的特点：境内的各民族在千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已形成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许多民族还长期在同一个地区杂居。这些特点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现实生活的主流。《共同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自治区是统一国家的一部分，可以在不违背中央统一政令的前提下自定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例。这是新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创造。如果不实行这样的制度而实行联邦制，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不可能有后来的局面。它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是三个要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个和以往不同的全新基点上起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这天下午二时，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644 页。

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1]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接着，首都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通常称为“开国大典”。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有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三人。新华社在当天报道了大典盛况。此时此刻的历史性情景值得在这里转录下来：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时，在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见另电）。

毛主席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阅兵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任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受阅部队随即分列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前后历时三小时。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十四架在全场上空由东向西飞行受阅。在阅兵式中，全场掌声像波浪一样，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阅兵式接近结束时，天色已晚。天安门广场这时变成了红灯的海洋。无数的彩色火炮从会场四周发射。欢呼着的群众在阅兵式完毕后开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70、571页。

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主席台附近走出会场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入云霄。毛主席在扩音机前大声地回答着：‘同志们万岁！’毛主席伸出身子一再地向群众招手。群众则欢呼鼓掌，手舞足蹈，热情洋溢，不能自己。当游行的队伍都已有秩序地一一走出会场时，已是晚间九点二十五分。举着红灯游行的群众像火龙似地穿过全城，使新的首都浸在狂欢里直到深夜。”^[1]

《人民日报》在报道开国大典同天发表的文章饱含深情地写道：“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它宣布了旧中国完全死亡，宣布了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屈辱的殖民地与殖民地奴隶的代名词，而要永远地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尊敬了。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屹立于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祖国，有了真能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2]

开国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立刻开始组建，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始办公。新中国的政府机关，是在打碎旧有的政权机构后重行组建起来的，处在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要从头做起。

但新中国的诞生同俄国十月革命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在长时间内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内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夺取全国政权的。由于各项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里负责管理，所以在新政府筹组过程中，整个工作并没有发生停顿或中断。

当然，从原来分散的、主要在农村的地方性政权，到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府，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政务院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不设国防部，军事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政务院各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作为基础建立的，但并不等于现成地把它拿来使用。华北人民政府的职能只是管辖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二市（北平、天津），现在要管理全国，自

[1]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2] 林韦：《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然有很大不同：政务院有些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中是没有的，需要组建，如外交部；有些工作部门原来虽有机构，但在新形势下需要细分，如中央财经委员会所属各部委；还有些部门过去是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的，如公安部、铁道部，改隶政务院后，也要经过必要的调整。

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员，有不少由中国共产党外的人士担任。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确有许多在这些方面有经验有知识的人才，如担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邮电部长朱学范、司法部长史良、文化部长茅盾、教育部长马叙伦、林垦部长梁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等；另一方面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士，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大体上由三类人组成：一类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一类是原来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工作而留下来的人员；一类是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和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这三类人各有长处和短处，正好相互取长补短，协同工作。

新政府在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已有《共同纲领》可资遵循，一开始就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在建立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还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一直建立到基层，把全国人民空前有效地组织起来。

万事起头难。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事情处于草创时期，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戎马倥偬，各方面的工作千头万绪，时间又不容许久拖不决。如果那时轻率地作出一些错误决定，它所造成的恶果将十分严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头来看，可以惊奇地发现当年作出的那些重大决策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的影响不仅在今天让人能强烈地感受到，并且还将延续到将来。这是新中国缔造者

们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遗产，是他们对中华民族作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新中国的第一年

新中国已经诞生。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它究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迈开大步前进，还是会坚持不住而失败？

这种想法，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虽已建立，它面对的考验依然是严峻的。三个突出的问题摆在面前：第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仍有白崇禧、胡宗南等集团的一百五十万军队，盘踞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准备顽抗。在各地，还有二百万武装土匪。他们盘踞山林，为非作歹，荼毒一方，很多并不站在明处，而是藏在暗处，在当地有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有的还是从多少年前一直传袭下来的，铲除它谈何容易。第二，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区，人民政府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经济总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烂摊子。国民党政府对这些束手无策，人们正注视着新中国有没有能力扭转这种仿佛已积重难返的局面。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城市中的大批失业现象，也给人民政府带来很多困难。第三，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很复杂。美国政府当时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实行禁运和封锁。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放心，担心它成为第二个“铁托”。周边的民族独立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还存在不少疑虑。如果在外交工作中处理不当，就会陷于孤立，或者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怎样应对同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这许多棘手问题，使人民政府真正站住脚跟，确实极不容易。何况新中国创建伊始，不仅需要处理当前的大量繁复而紧迫的问题，还必须有更长远的眼光，建立起一整套和旧中国根本不同的新制度和新格局。这些制度和格局处理得恰当与否，对中国此后的发展将有长远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必须很快作出决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冷静而果断地沉着应对，

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我们先来看前面两个问题，也就是军事和财政经济问题。

军事上的进展是顺利的。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喊出“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一人止步，万人遭难”、“一时动摇，万世受苦”等口号，^[1] 大举南下。进军的重点，是要消灭白崇禧和胡宗南两个军事集团，解放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

白崇禧是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军事指挥灵活，素有“小诸葛”之称。所部有二十二个军共三十五万多人，其中包括战斗力较强、以往没有受到沉重打击的桂系精锐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白崇禧的总部在武汉、长沙相继解放后移驻湘南的衡阳。此外，在广东地区还有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所部七个军，约十一万人，但战斗力并不强。

为了力争干净全部地歼灭白崇禧集团，不让它撤往境外或海南岛、台湾，留下更多后患，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用“远距离包围迂回”这个以往没有实行过、出敌意外的作战方针。

这个方针的确立有一个过程。一九四九年七月，第四野战军曾采取过去常用的诱敌深入、近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企图捕歼白崇禧部主力于湘赣边境的浏阳、醴陵以东地区。白崇禧发现解放军主力正向它两翼迂回，立刻下令全线撤退。这次战役在七月十九日结束，只歼灭了白部四千六百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毛泽东在这次战役快结束时的七月十六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提出：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西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者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我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

^[1] 穆欣：《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11月版，第115页。